



# 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超级城市“移民”与“洋插队” 如何看待“老”年人的“新”移民

随着新一轮城市化的发展，这一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家庭婚姻、城市文化、族群关系和社会整合等文化转型将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。

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转变就是从地域性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。所谓地域性社会，核心在于人与土地的紧密嵌合，农民依附于土地，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，血缘和地缘关系相互交叠，形成在空间上相对孤立和隔阂，极富地方性的社区单位，也即村落。费孝通先生精辟地将其概括为“乡

土中国”。

而中国的城市是建立在地域性社会之上的。这类城市的居民以周边农村移入城市为主；以某种方言群体构成城市人口的主体；是某地域行政区划的中心；而户籍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促进了地域性城市的发展。这类城市基本上是把地域性乡土社会的模式搬到了城里，城市的乡土性构成了中国城市一大特色。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的实行，大量农民工进入企业、城市，开始了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

浪潮，到2010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.6亿，可以说中国的“移民社会”已经到来了。

2011年，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，中国从传统地域性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，城市也在经历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变。

城市转型，即从地域性社会到移民性城市的转型，具体而言，指城市人口结构、社会文化、族群关系、社会结构和社会整合等发生改变。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发展，城市人口结构发

生了变化，不论是人口来源还是人口特征，都由单一性、同质性向多样性和异质性转变。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，伴随着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婚姻家庭、族群之间的关系、社会整合等发生了巨大变革。在城市文化上，不同的移民文化相互交融，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城市文化应运而生。

在过去三十年里，大约有2.6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，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。仅在2000年至2010年间，就有1.17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。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引擎，沿海地区接收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人口。接收国内移民人口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、东莞、广州和上海等城市。在2010年，这些城市共接收了超过5200万人，占国内移民人口总量的35%。

目前，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.3亿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，2000至2010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80%。但是，这些外来人口难以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，也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等。目前，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%。预计到2030年，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，占总人口的70%。中国的国内移民在城镇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

色。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循环来往于城市和自己的家乡，上演着一年一度的“春运”。对于孩子来说，他们比较容易适应新的生活环境，老年人相对而言，障碍就会增加很多，医保、养老、社会关系、生活习惯，都会影响他们“移民”生活的质量。

另一个方面，改革开放也打开了国门，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海外移民的机会，1984年，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接收10万名留学生的宏大计划，使得中国留日学生出现高速增长。但是留学日本易，移民日本难，真正由留学生增长而带动的移民潮，出现在加拿大和美国。1985年后几年间，加拿大接纳了约7万中国大陆新移民。1970年侨居美国的中国移民不过44万人，1988年则达到108万人，增长迅速。

除了留学外，跨国婚姻也是一个途径。改革开放之前，已经有了一些人实现了海外婚姻，到了1979年，已经有8000多人通过海外婚姻实现了移民。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1988年2月获得学生签证，进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习，两年之后通过和美国

人结婚才获得美国绿卡。当时，移民不仅吸引知识分子、明星，也同样吸引着普通百姓。移民海外意味着可能有优厚的收入前景，

1990年，中国城镇居民月收入约为200元人民币，同期很多美籍华人的收入约为1850美元，相当于国内收入的五六十倍。在这种巨额薪资差别的诱惑下，东南沿海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一村的村民一起移民海外的现象。

在这样的氛围中，留学被戏称为“洋插队”，如同真正的插队生活一样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在国外经历过艰难的历程。而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移民，他们更多扮演的是开拓者的角色，无论大小人物都为了扎根异国，付出了不为人知的辛酸。

不论是城市移民，还是洋插队，这批“新移民”已经进入了经济相对稳定的阶段，出生不久的宝宝，逐渐老去的父母，都成为了不得不面临的问题。于是，老年人成为“新移民”的现象开始大量产生。老年人往往出于被动移民的状态，多数是听从儿女的安排，他们中有人得到了思念已久的天伦之乐，有的人开始面临措手不及的烦恼。老年人移民，会面临诸多现实的问题，医保、养老、社会关系、生活习惯，都会影响他们“移民”生活的质量。本文将从各个层面展现这些银发“新移民”的生活状态，希望能管中窥豹，给大家带来一些经验和启示。

